

谁主沉浮

孟醒◎著

——中共一大代表沉浮录

献给五四运动九十周年
暨建国六十周年



人民
出版
社

历史沉浮录

孟醒◎著

——中共一大代表沉浮录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长虹
装帧设计:徐 晖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主沉浮/孟醒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

ISBN 978-7-01-007523-5

I. 谁… II. 孟…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1517 号

谁主沉浮

SHUI ZHU CHENFU

孟醒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5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01-007523-5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一大谜团(代序)

一个事件的最重要因素,无外乎时间、地点与参与其中的人物等。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重大事件中,上述诸多要素在亲历者的回忆中就相互龃龉,甚至同一个人的回忆因为历史条件的变化即有不同,就此形成“一大谜团”。几十年来,相关研究者爬梳考证,新说丛出,也争论不断,某些方面至今仍难有一致的结论。

先说一大的开会日期。

“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纪念日,早已成为惯例,因此“七一”就被当然地视作一大开幕的日子,其实并非如此。对于一大开幕的日期,存在着6月、7月1日、7月23日、7月底等多种说法。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的党史专家以及香港的民间研究者邓文光依据国内外大量史料,并根据尚健在的亲历者的回忆,再参照代表行踪、会场被法租界警探搜查记录等,最终考证出一大开幕的日期是7月23日。其中,陈公博于大会闭幕后不久所撰《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成为推断出一大开幕日期的重要一环。因为此文写于会议结束不久,其回忆的准确性就比较高。他说,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见面的时间是在“到上海的翌日”,即一大的第一次会议上,而陈抵达上海的日期则为7月22日。由此即可轻松地推断出一大的开幕日期为7月23日。

对于建党日期,毛泽东曾提出过6月说。只不过他后来又改变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人的记忆并不完全可靠。邓中夏与李维汉等也曾持6月说。这一说法的来源是上海临时中央发出的通知,通知上确定的开会时间是6月30日。但是到了6月底,与会的代表只有少数人抵达开会地上海,会议不得不改期举行。将通知的时间当作实际开会的时间,才有了6月

的说法。1939年10月，中共中央的《共产党人》创刊，毛泽东写的发刊词，原有“一九二一年六月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该文后来被编入《毛泽东选集》，“六月”二字就被删去了。后来，毛泽东自己也察觉到“六月”建党说存在偏差，并改为7月建党。当时在延安，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人出席了一大，但他们只记得是在7月份，仍不能定下确切的日期，于是就象征性地选择了7月的第一天作为建党纪念日。实际上，建党纪念日和党的生日之间并不能完全画等号。1940年，毛泽东在延安的一个讲话中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明年是党的二十周岁，我们党从七月一日起庆祝一个月。”随后，延安的《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党准备于1941年7月1日，庆祝党的20周年纪念。这个日期在1941年6月，被载入中央文件，“七一”作为党的生日就这样正式确定下来。很大程度上，选定七月一日是为了记忆的方便。并没有考虑日期本身的真假问题，以至于海外曾据此大做文章，叫嚷共产党在自己的生日上都敢造假，实在是可笑得很。陈潭秋回忆说，是1921年7月底。这些都只不过是记忆上的偏差，根本不存在说谎的企图。连叛党的一大代表张国焘都一直支持“七一”建党说应该能说明问题。这一方面是当事人回忆上出现了偏差，另一方面是因为建党活动处于秘密状态不可能有可靠的公开记录，尤其是会议中间有巡捕闯入打乱了原定议程，导致会议转移地点并提前结束，从而为记忆的偏差留下了方便之门。

笔者认为，党的生日就好比一个人的生日一样，早一天晚一天，早一月晚一月，甚至早一年晚一年，都无法割断和损毁她光荣的历史。

1980年，《人民日报》载文给出了1921年7月23日的说法，算是对党史专家多年努力的肯定。在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生日确定为7月23日。

因此，一大的日程表大致如下：

7月23日开幕，召开第一次会议，制定议事日程并听取汇报。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继续听取代表的汇报。

7月25日-26日休会，起草委员会制定“章程”和“实际工作计划”草案。

7月27日-29日，连续召开第三、四、五次会议讨论“章程”草案。

7月30日夜，第六次会议因侦探闯入和其后的租界警察搜查而中断。最后一天的会议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

那么，在嘉兴南湖这最后一天，也即一大闭幕日是哪天，又出现了分歧。很显然，7月30日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就是在这一天的夜间，转移到嘉兴南湖需要时间来操作。至于是哪一天？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说法。

对于7月31日，有多位代表的回忆作支撑。之所以记忆这么清晰，就是因为侦探闯入这一突发事件给代表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其中，包惠僧在1953年回忆说：“大家商量了一下，就决定明天到嘉兴南湖尽一日之长来结束这个会。次日黎明，我到了火车站，约10点左右我们到了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董必武在1971年回忆说：“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召开，是由李达的老婆王会悟租了两只船开的。”

质疑者认为，在当时的混乱状况下，安排好第二天的行程，时间太仓促，恐怕来不及。支持者认为，当时大多数代表住在博文女校，个别虽分散在各处，但相距并不远。即使不是分头通知，仅由一人传递信息也来得及。据查1921年7月沪杭铁路行车时刻表，早上7时35分上海有快车至嘉兴，到达时间是10时25分。这一点，与包惠僧的回忆也相吻合。也就是说，第二天在嘉兴南湖开会，条件是完全具备的。

陈公博虽然没有去南湖，但他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却给出了确切的日期。他写道：“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在睡梦中忽然听到一声很尖厉的枪声，继而便闻有一女子锐厉悲惨的呼叫。”这样的夜半插曲，足以令陈公博印象深刻。

周佛海在《往矣集》里提到同一件事时说：“公博当时正带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东旅社……哪知他隔壁的房中，当夜发生了一件奸杀案，开了两枪，打死了一个女人，公博夫妇真是吓得魂不附体。”于是，陈公博夫妇没有去嘉兴，而是去了杭州。

将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与上海《申报》《新闻报》的相关报道相对照，发现这一天就是7月31日。

但张国焘等人回忆说：“在上海第六次会议受到搜查后，第二天即停会，隔了一日再到南湖将会开完。”张的说法如果属实，那么大会闭幕的日

期就应该是8月1日。但据1921年8月3日《申报》的《地方通讯》报道,8月1日下午5时许,嘉兴南湖阴云密布,狂风大作,房舍多有损坏,“最惨者,南湖中之避暑游船……被风吹覆者四五艘……而溺毙者竟有三人”。这样的气候条件显然不适合在游船上开会。如果遇到了这种天气,就像侦探闯入一样,代表们不可能不留下印象。可没有代表在回忆中提到遭遇了风暴,这一点让人疑窦丛生。

8月2日的说法,来自王会悟的回忆,但并没有令人信服的材料来印证。

8月5日的说法,源自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斯基的信件》。信件明确提到会议在8月5日闭幕。并解释说“根据尼科尔斯基同志的建议,我们决定打电报给伊尔库茨克,向他们报告(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进程”。在这里,斯穆尔斯基并不是大会的参加者。他只是一大会议参加者尼科尔斯基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传话人。而有关8月5日的说法极有可能是尼科尔斯基在一大召开前的报告,预定的闭幕日期在8月5日。而此后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不得不匆忙结束。尼科尔斯基和马林没有参加在嘉兴南湖的会议也可以作为一个反证,证明这是事前的报告。

使开幕日和闭幕日的日期都有了合理的解释,但仍有人提出,在一大与党的成立之间并不能画上等号。之所以将一大与党的正式成立之间画上等号,是源自毛泽东后来的政治影响,并明确说党的成立在前,一大召开在后。其根据就是,早在1920年8月,陈独秀即在上海开始了创党活动。同一年的10月,有李大钊在北京的创党活动。这也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来源。另有“南谭北李中间陈”的说法,这里的谭指谭平山几乎在同时于广州开始活动。其标志就是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制定,以及《共产党》月刊的创刊。

接下来,再说说地点,也就是一大的会址。

一大开会的地点,当年是明确的,就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所租住的房子里。可具体在哪条路多少号,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说法。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大局已定,终于有条

件确认自己组织的诞生之地。此后的1950年夏末秋初，上海市长陈毅交代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姚溱，去寻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而这个时候，离一大召开已过去了近30年。期间，屡经战乱，当年的建筑是否安然无恙，实在是一个未知数。为了完成这项特殊的任务，还成立了一个以姚溱、杨重光和沈子渝为主要成员的寻访小组。

不久，寻访小组通过上海市公安局找到了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杨淑慧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她说周佛海在他的回忆录《往矣集》里，记载了一大召开的情况。沈子渝由此在图书馆中查到了1942年出版的《往矣集》，书中说一大是在“贝勒路李汉俊家”召开的。

正是在一大召开前后，杨淑慧与周佛海开始恋爱。那时，周佛海常带着杨淑慧去李汉俊、李达的家里，再加上杨淑慧本人就住在上海，对那一带的情况自然熟悉。抗战期间，周佛海附逆，他们仍生活在上海。因此，杨淑慧是最合适的寻访人。可当年的贝勒路连名称都变了，改称为黄陂南路。几十年来，街道格局的变化虽称不上翻天覆地，但在杨淑慧这个老上海眼里也堪称巨大。因此在几天时间里，来来回回走了多少趟，杨淑慧仍不能确定到底哪所房屋是李汉俊当年租住的居所。这说明杨淑慧很明白此次任务的重要性。直到有一天，杨淑慧站到贝勒路与兴业路的交叉口，看到“恒昌福面坊”的大字招牌，才终于认定兴业路76号就是李汉俊曾经住过的地方，也就是当年“一大”开会的地方。

而兴业路在1943年之前是被称为望志路的，兴业路76号以前的门牌号是望志路106号。李书城、李汉俊兄弟当年租住的是紧挨着的106号和108号，会议是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里举行的。

后来，董必武、李达、包惠僧又受邀前往核实。在毛泽东、董必武看了上海市委上报的审定材料之后，一大会址最后得以确认。

与地址相关联的谜团则是会场为什么会有侦探突然闯入，后又遭到搜查？简单说，是因为当年的外国人即使在上海数量也并不多，其行动颇为引人注目。如果是偶尔出现，过去也就过去了。可开会时，一连几天有外国人出出进进自然就引起了法租界警局的注意。尤其是马林据说在来中国途中可能就被盯梢。另外，有资料显示，日本警视厅在6月就得到了会议要在上海召开的情报。尽管这份情报没有标示来源，但其最可能的来源应是上海

的机构或个人,其间也掺杂着日本与西方主要国家的情报交流。再联系到1921年7月31日《民国日报》报道,法租界宣布的取缔集会条例。这个条例制定的背景是不是和一大有关,虽然不能妄下结论,但它发布的时机无疑是耐人寻味的。就此来说,一大虽然是秘密举行的,但其被搜查却是必然的。其实这个必然背后仍隐藏着一个待解开或者永远也不可能揭开的谜团。

偵探搜查迫使会议转移会场,并在没有完成预定议程的情况下于嘉兴南湖匆忙结束。突发事件是造成一大诸多谜团的直接原因。

最后,说一说代表的人数谜团。

如果说对于开会的时间因为记忆有误,开会地点因为时代变迁等原因一时无法确定,更多的是客观因素。那么,代表人数的种种说法,其间的主观因素就多一些。

当时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的代表,对于这第一次的重要性几乎没有什么概念。再说当时代表的党员才五十几人,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客观地说,起码在当年没有人能预测到这个党会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第一次的重要性随着党的地位的提高,才愈益加重了其砝码。那么,这个第一次的代表也因之有了不同寻常的位置。代表人数是13人,12人,11人,10人,才在多年之后随之出现。几十年以后,经过党史专家的考证,终于得出一个大家都认同的结论:当时的代表为13人,他们是张国焘、刘仁静(代表北京)、王尽美、邓恩铭(代表济南)、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李达、李汉俊(代表上海)、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陈公博、包惠僧(代表广州)、周佛海(代表日本)。再加上两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参加会议者共为15人。这个过程并不像说起来这么简单,其中尤以12人说的影响最大也最广泛。

12人说的来源有多个,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张国焘,另一个是共产国际的报告。毛泽东在1936年秋同斯诺谈话时,说参加一大的代表是12人,但没有列出代表名单。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又说是12人。这个时候,毛泽东在党内已确立了真正的领导地位,他的说法也就带上了权威的意味。

在此之前，周佛海于1927年发表的《逃出了赤都武汉》中说，参加会议的代表是13人，并给出了除两位济南代表之外的名单。1936年，陈潭秋在莫斯科写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也说是13人，并给出了济南代表王尽美、邓恩铭的名字。这两份回忆加起来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代表名单，可惜在毛泽东谈话之后，13人的说法就靠后了。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里也说是12人，且在列出的名单里去掉了何叔衡。为什么是何叔衡？他给出的理由有些让人啼笑皆非，他认为何是位“冬烘先生”，对共产主义完全无知。并说，他因为听不懂大家讨论的内容，提前离开了。

这其中董必武的看法是有变化的。在1959年之前，他一直坚持13位代表的说法。他在1937年接受尼姆·威尔斯的访谈时，还给出了13位代表的名字。此后，他多次的相关谈话都说是13人。1956年的时候，他仍然坚持说，“关于代表名额，过去发表的都是十二人，在我的记忆里，却好像是十三个。”在1959年的时候，他看到了中央档案馆送给他的苏共移交的有关一大的材料，也就是共产国际的报告，里面说代表人数是12人，他认为，“在未发现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并说，“我过去对‘一大’代表人数，是同意陈潭秋同志回忆的说法‘十三人’说，今后我愿意放弃这个意见。”可据后来的考证，共产国际的报告，是将陈公博排除在外了。原因是陈公博没有参加在南湖的闭幕会议，上报国际的闭幕会议决议自然没有他的名字。董必武是受了这个材料的影响，有没有毛泽东确认12人说的影响，恐怕难以排除。

在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12人说就成了定论。李达在1949年前后写的自传里，给出的代表名单里则排除了包惠僧。他写道：“包惠僧并不是由地方党组织推选到上海出席的代表……7月1日晚上开会的时候，包也随代表们开会去了，代表们也没去拒绝他，这是事实。因为当时并不知道组织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但代表们并不承认他是代表。事后，包惠僧自称是广州党组织的代表，这不是事实。广州代表只有陈公博一人。”

按照李达的解释，包惠僧确实参加了会议，但又不是代表。董必武同意12人说之后，说道：“广州市一个人，实际到了两个，有一个包惠僧，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是列席的，不是代表。”另有人解释说，包惠僧是作为陈独秀的

私人代表参加一大的,算不上正式代表。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毛泽东在讲话中也明确排除了包惠僧。这么一来,12人说几乎成了不可易移的真理。

那么,为什么焦点集中在包惠僧身上呢?其中的原因确实耐人寻味。首先一点是为了证明毛泽东12人说得正确;其次是因为包惠僧后来有过长期的脱党行为,并在新中国成立势所必然的时候,仍在观望;再次,是不是其中含有个人恩怨的因素,仍然是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另外,是不是包含对陈独秀不来参加会议,且说包惠僧可以代表自己有反感?

而关于包惠僧的代表资格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没有任何一位代表质疑包的代表资格问题。正如李达所说,当时并没有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代表资格问题。当时,李达、李汉俊在上海发出与会通知的时候,只是让各地的小组派出两位代表,并没有指定由谁参加,只要是小组派出的与会者无疑就是当然的代表。有人说包惠僧来自武汉,这没错,但只要广州推荐他参加会议,他就是广州的代表。这一点,除了海外代表一人,其他各地方小组的代表都是二人,就可以很清楚地得出结论。

11人的说法,则将两位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排除在外。原因是他们当时都是中学生,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10人说的理由是,何叔衡提前走了。在遭到法租界警探的搜查之后,会议转到嘉兴南湖继续进行,李汉俊、陈公博又未能赴会,最后的代表是10人。

此外,说到一大代表问题,“南陈北李”是绕不过去的。他们两人是中共的最早创始人,具有无可代替的特殊位置。但他们为何没有参加一大,这又是一个谜团。

据说,召开一大会议的通知发出时,陈独秀正在广州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又兼任着大学预科校长。广州小组开会决定代表时,陈独秀说,自己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无法脱身。并当场委派正在广州向其请示工作的武汉小组成员包惠僧参加大会。另一人则指定了陈公博,鉴于当时陈独秀的威望,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包惠僧后来回忆说:“陈独秀年长,我们又都是他的学生,他说了以后大家就没有什么好讲的了,同意他的

意见。”

如果说脱不开身是托词，不如说是借口更合适。要知道除非你是职业革命家，哪个人没有工作在身？工作和代表大会两相比较，哪个更重要？即使在普通党员心里也不会没有明显的倾向性，那么，在陈独秀这个党的创始人心里不可能没有想法。不过他的想法并没有在年轻的同志们面前表现出来，那就是对共产国际代表来到中国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召集代表大会，要控制中国党的活动，心有不满。这一点从他与共产国际代表合作中的诸多不愉快中很容易看出来。但也有人认为，陈独秀觉得没有事先和他沟通就通知开会，是突然袭击，且觉得自己受了轻视，因而以不出席表示一种有限度的抵制。

李大钊又为什么没有出席呢？他当时连北京小组推选赴会代表的会议都未参加，更别说出席在上海的会议了。同样是在这次会上，邓中夏、罗章龙虽然都出席了会议，但他们都声称自己不能去上海开会。起码，在这个时候，他们并没有认为将要召开的会议有多么重要，当不当这个代表也没有什么了不得。最后，是张国焘和刘仁静被推举为北京小组的代表。对于李大钊没有被推举为代表，张国焘解释说：“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大会。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刘仁静回忆说：“会前是否征求李大钊先生的意见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气，就是征求他的意见他也不会反对。”

当时，李大钊是北京小组的领导人，且人在北京怎么会不参加小组的会议呢？解决了此一问题，就等于解决了他为何不去上海的问题。有说法称，时值假期将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的工作过于繁忙，一时难以脱身。原因似与陈独秀相同。另有研究者称，李大钊未能出席一大缘于他受伤住院。

事情起因于1921年3月，北京教育界因校方拖欠薪水而发起的索薪运动。当时，以北京大学为首的八所公立学校成立了“北京国立专门大学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北大教授马叙伦是联席会议主席，李大钊是联席会议新闻总办，在马叙伦有事或生病时代理主席职务。

在6月3日的请愿中，马叙伦等被军警殴致重伤，面临生死之危，李大钊被打至昏迷，均被送入医院。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马林抵达上海。等

到李达、李汉俊发出会议通知，李大钊仍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因之无法参加北京小组的代表推选会议，同时也就失去了参加一大会议的资格。

但是，稽考李大钊长子李葆华的回忆录和李大钊的好友胡适写于那个时期的日记，都没有李大钊住院的记录。那么，李大钊究竟是为什么没有出席一大，至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答案。

笔者觉得，如果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确定在1920年11月，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出席一大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毕竟“南陈北李”都没有参加一大，因此本书也就不将他们列出单独的章节，但在书中的许多地方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

一大代表中的大多数人，在变幻的时代风云中，生死的考验面前始终坚定地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李达、陈潭秋、何叔衡、邓恩铭、王尽美七人。有的人因为与党内同志产生过意见分歧，甚或个人恩怨，离开了这条曲折却光明的道路，成为了党内反对派。但经过或长或短的反复之后，他们又作出过或大或小的贡献。他们是李汉俊、包惠僧、刘仁静。另外三个人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先后脱党叛变，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应该说在最初的起点上，他们是肩并肩站在一起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掉队了，有的人掉头了？为什么美好的种子，生长出来的并不全是美好？原因是那个巨变的时代扭曲了某些人的人格，还是某些人的人格顺从了黑暗的势力并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帮凶？当然，让人无话可说的答案很简单，那就是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但是，我固执地认为这里面必然有起着决定作用的因素。联想到上个世纪20年代，也就是共产党成立的年代。社会主义是中国大多数青年所追赶的时髦。蒋介石早年也喜欢看《新青年》，也倾心过社会主义。可是时尚的风潮一过，高低的分野立显。

因此，将一大代表们的起点作为坐标的原点，社会主义作为横轴，时间作为竖轴，大致画出十三人的人生曲线，不会是无意义的事情。实际上，思考为什么他们会从相同的起点，走上不同的道路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深思索的问题。这也是我写作本书的最初起因。

是为序。

目 录

一大谜团(代序)	(1)
第一章 王尽美(1898—1925)农工先锋 鼓动斗争	(1)
一、出身贫家的师范生	(2)
二、奔走乡间	(3)
三、工运先锋	(6)
四、劳累早逝	(17)
第二章 李汉俊(1890—1927)半途退党 倾向革命	(19)
一、社会主义思潮的宣传家	(20)
二、上海党小组的创建人之一	(23)
三、与陈独秀、张国焘政见不同而脱党	(25)
四、死于白色恐怖	(28)
第三章 邓恩铭(1901—1931)不惧挫折 献身理想	(31)
一、贵州水族少年求学山东	(32)
二、罢工运动的领导者	(34)
三、越狱的组织者	(36)
四、身份暴露遭枪杀	(38)
第四章 何叔衡(1876—1935)信念石坚 视死如归	(41)
一、年龄最大的代表	(42)
二、江西苏区法律制度的创建者	(44)
三、突围转移途中遇难	(48)
第五章 陈潭秋(1896—1943)奔走革命 被害新疆	(53)
一、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者	(54)

二、为革命四处奔波	(58)
三、宁死不当逃兵	(59)
第六章 陈公博(1892—1946) 私欲熏心 随欲而变	(65)
一、宦宦之后	(66)
二、五四运动的旁观者	(67)
三、迫于生计入阁国民党	(70)
四、汪伪大员	(73)
五、被枪决的汉奸	(78)
第七章 周佛海(1897—1948) 红黑丕变 左右逢源	(85)
一、留学东瀛	(86)
二、偶然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	(87)
三、转向国民党	(89)
四、投入汪精卫的怀抱	(92)
五、拒绝中共的挽救	(96)
六、病急乱投医	(99)
七、病死狱中	(108)
第八章 李达(1890—1966) 脱党入党 “文革”惨死	(111)
一、最早的理论家	(112)
二、意见不合而脱党	(114)
三、重新入党	(116)
四、与毛泽东争论	(118)
五、惨死于文革	(122)
第九章 董必武(1885—1975) 党内元老 光明磊落	(131)
一、同盟会员	(132)
二、武汉党小组的创始人	(133)
三、情报工作的领导者	(136)
四、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元老	(139)
五、不忘“群言堂”	(142)
第十章 毛泽东(1893—1976) 奋斗终身 勋绩永存	(149)
一、一大的普通代表	(150)

二、多次遇险	(151)
三、中国共产党第一位置的领袖	(154)
四、林彪事件的影响	(156)
五、病中决策	(158)
六、眼部手术	(161)
七、逝世震惊世界	(165)
八、毛泽东永恒的遗产	(167)
第十一章 张国焘(1897—1979)前半辉煌 后半潦倒	(171)
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	(172)
二、一大时出尽风头	(174)
三、隐瞒曾被捕	(176)
四、长征途中的分裂	(179)
五、设计逃离延安	(182)
六、流落异国 冻饿而死	(187)
第十二章 包惠僧(1894—1979)资格受疑 命途曲折	(191)
一、代表资格遭怀疑	(192)
二、白色恐怖中脱党	(197)
三、观望中回归	(199)
四、晚年留下党史资料	(201)
第十三章 刘仁静(1902—1987)挫折于托派 丧命于横祸	(203)
一、最后去世的一大代表	(204)
二、北京党小组的创始人	(205)
三、托洛茨基的信徒	(207)
四、反省自己	(212)
五、“文革”磨难	(218)
六、罹难车祸	(220)
附录 马林(1883—1942)与尼科尔斯基(1898—1943)	
国际使者 树勋异国	(223)

王尽美(1898—1925)

农工先锋 鼓动斗争

能参加中共一大,他感觉是自己一生的幸运。回到山东后,他以巨大的热情、百倍的努力为这种光荣而工作。他奔走乡间工矿,发展组织,开展运动。他以民众最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宣传鼓动搞得有声有色,成绩斐然。他的投入使他的生命过早透支,1925年8月,因积劳成疾,他逝世于青岛医院。他的生命虽然短暂,却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